

三

抓浮浪 辅导院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伪满弓长岭矫正院惨状

刘万忠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到1940年，日伪开始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加以控制。1942年9月17日夜12时，对所谓经济犯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我也是被捕者之一。兹将被捕经过和矫正院的惨状叙述如下：

1942年（康德9年），我在前所土台子老家行医（半医半农），因药品受日本人控制买不到，我常去山海关某药店买些零星药品来卖。这事被大甸子警察分驻所便衣特务费忠发觉，给我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经济犯”。旧历九月十七日夜12点，有人到我家叫门，闯进来两个警察——樊警尉和另外一名警察，后面还跟着十几个棒子队（自卫团丁）。樊警尉问我说：“你叫刘万忠吗？”我说是。他即命我把衣服穿上，到前庄牌长赵守和家去一趟。我到牌长家一看，屋里绑着3个人，有本屯赵玉山、赵海山，核桃树屯邢文余。樊警尉说：“把他（指我）也绑上”。接着把我们4个人带到屯头，上了两辆胶轮大车。途中到高岗山庄又抓了一名吴宝仲，一同拉到大甸子分驻所。所内已经抓来了13名，加上我们一共18名。当即用4辆大车把我们送到前卫警察署。第二天连同别的分所抓来的共计42名，全送到绥中南路法院，住了5天。第一批（我在其内）送锦州20名。在锦州法院监狱又押了20天。这天早晨，监狱门打开了，一个警尉来对我们训话，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把你们送到弓长岭矿山采矿石，吃的好穿的好，最多3个月就回来，大家安心好

好干。”当日晚上7点钟，我们24个人被送到锦州车站，乘夜车到了弓长岭矫正院。

矫正院院长是日本人，叫百叶。下有4个科，计：“劳动科、业务科、庶务科和医务科。科长都是日本人。除这4个科外，还有100余名监视犯人的辅导士。全院共分18个小队，每个小队90人（小队长也是犯人），总计有1600余人。我们到院后，根据各小队现有的缺额，把我们分别补充进去。赵玉山和邢文余被分配去鞍山矫正院（听说到那里二十几天就都被活活打死了）。我被分配到第三小队，小队长叫王祥，山东人。到小队后，首先把我身上的棉袄袖子和棉裤腿都用刀割去半截（下面成锯齿形）。割完后小队长说：“你们这期来的人真有福气，以前进来的人都得剃眼眉，你看我就没有眼眉。”听说以前剃眼眉后，有的人描上眼眉，还是逃跑了，所以改用割半截袖子的办法防逃跑。

住的地方是每个小队9间房，对面板炕，破玻璃窗户四面透风，墙壁挂满霜雪。睡时以鞋当枕，合衣而卧，冬天冻得睡不着，起床时身旁都是霜雪。为了防跑，夜间大小便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去，还得赤身露体。睡觉时不脱衣服，大小便时却必须把衣服脱光，与在家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厕所忘了脱衣服，叫辅导士发觉，被打了一顿耳光。

吃饭是一日两餐，都是发霉的秫米稀粥一小盆（3两米），副食是每顿一条一指宽一寸多长的咸菜。在吃饭前都要盘腿正坐，低头默祷，然后才准吃饭。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5点吃早饭，5点30分到工地劳动，每天干12小时活。从住处到劳动场所有五六里地，途中不准左顾右盼，低头跑步走，稍慢一点，非打即骂。我们3小队有个抚顺人佟明涛，在途中被石头绊倒，就被辅导士打了几洋镐把。到工地后就下井作业。这里有竖井12道，

每道30米深。我在三、六两道作业，收渣子。井内没脚面深的水，常年不见太阳。如因疲乏直直腰就要挨打。有一次我一直腰，立时挨了3镐把。

作业任务是每人每天装3车，共计18吨，不完成不许出井。延长一二小时是常有的事。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还不许四下观望，由上面掉下渣子来也不许躲避，因此经常发生打死人的事。我们三小队一个姓张的（名忘记，小名小胖），就是被掉下来一块矿石打死的。最危险的是冒顶，一冒顶就是几千车矿石落下来。和我们同一掌子作业的第四小队（他们是夜班），就是由于冒顶，全小队90人都被砸死了，把人砸得都成了肉饼。类似这样的大事故一年不知出多少次。

除此之外犯人最怕生病，轻病号干零活，干不动就被活活打死。重病号不能干活，就活活饿死。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在病号房有人病得很严重，辅导士硬叫他出工，他不能劳动，就被打死了。这种惨事举不胜举。

又如一个日本人因病死了，衣服被人剥去。当时是下雪以后，在尸体旁边发现有前后打钉子的鞋印，日本人就找穿这样鞋的人，见到第三小队聂桂香（绥中高岭南老爷庙屯人）穿的是这种鞋，不容分说，就活活把他给打死了。其实那衣服是被一个辅导士剥去的。

犯人的尸体，不论是病死、打死还是砸死的，都运到距住处七八里的西山，那里有一个万人坑，坑边有一个炼人炉，每隔十天半月炼一次。

去矫正院的人大多数都死了，由于抗日胜利，国土光复，我才得到活命回到家中。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满辅导院内幕

李春荣口述 范耀辰整理

我于伪满康德11年(1944年)9月27日被警察抓去,送往千山辅导院(亦称矫正院),后又转到弓长岭辅导院。在那人间地狱里受尽折磨,侥幸没有丧命,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才回家来。

我是怎样被抓去的

当时伪满政权要警察在各地抓捕浮浪者送往辅导院,要的数字很高,绥中县完不成这一数字,就命警察到处乱抓乱捕,于是那些平时不给警察进贡的就成了被抓的对象了。我们邻村赵家屯有个开店的叫孟相臣,还有刘把屯的周玉生、刘国存等,都是因为不给警察“斗”钱而被金警尉抓去的。

我那时生活困难,跑山海关贩布,因不愿对警察们行贿,警察张世忠即怀恨在心,处处想给我小鞋穿。有一次张世忠叫我给他请个局(即设赌抽头),我没给他请,他看我不愿为他驱使,遂即亲自出马,向平时好要钱的人每人要去10元钱,共计450元,还嫌少,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又逼我要(我也是好要钱的),我因为实在没有钱,没给他。有一天我外出不在家,张世忠带了几个人将我老婆抓去,进行拷打,百般刁难。后经张保年、张国清等说情,送去200元钱才算把人放回来了。

我回来听说此事非常气愤,就于4月21日去绥中县告状,因县里韩检察官和他们的黄署长相好,只给去个电话叫调解了

事。从此张世忠对我更加忌恨，时时在算计我。

9月27日我去串亲戚，走到半路，张世忠和李警尉把我抓去，一直送到城厢署。李警尉强迫我承认当时所谓犯法的事，或杀猪或买粮或赌博或其他什么都行。我不承认，旁边有两个警察就用木棒乱打。我被打得无法忍受，只好承认买粮2斗。3天之后，把我送到锦州，有个姓林的检察官公开地说，抓你们来就是去做劳工，什么浮浪不浮浪，没有浮浪就只有抓你们去充数了。你们做劳工要好好干，遵守纪律的半年就能回来。不然得干3年。你们是先走一步，用不多长时间连我这样的也得去呀！听他的话好像对劳工深表同情，但也无可奈何。半个月之后，我们这些抓来的人被装上火车，开到千山。当时上火车的有上千人，只绥中一地就有400名。有些有钱有门路的都托人活动，被放回去了，像我这样一贫如洗的人，只好遵命，别无出路。

千山辅导院

到了千山辅导院，那里已经有五六百名劳工在干活。他们都是由各地抓来的小贩、铁匠、农民等，在这里每天崩石子、运石子，劳动强度大。为怕劳工干得少，每一班都有二鬼子监工，并规定每人每天5车，完不成的就要挨打受骂，不能回工棚吃饭。居住条件也很差，许多人挤在一个工棚里，不烧火的炕能冰死人。每天只能吃到半饱，早晚每人一碗稀粥，午间每人给3个又苦又辣小得可怜的窝头，没有菜。洋鬼子和二鬼子不爱要的烟和鱼，在他们高兴的时候也给点。

鬼子还为劳工规定了些纪律：睡觉时不准说话，走道不准乱看，违犯就要挨打。每天上班前还必须唱“宣誓歌”，劳工们都把它叫“现世歌”。

由于吃不饱，干活累，人身没有保障，以致患病和死亡的很多。我在千山3个月，知道由绥中去的就死去十几个人，如头道河王庆玉、狗河城赵富、金屯的金守山等都死在那里了。

弓长岭辅导院

我在千山辅导院呆了3个月之后，又被转送到弓长岭辅导院。这里是和千山一样的劳工集中营，不过比千山规模大，折磨劳工更残酷罢了。

弓长岭辅导院有6000余人，由日本人和汉奸配合管理。设有辅导科和医务科。辅导科科长为日本人田中，副科长是个中国人。医务科长是中国人，下有5名医生。

工地的周围设有一道电网，还有岗哨，戒备森严。6000余人住在18栋宿舍里，当时人们都称之为18层地狱。

到这里还是开凿石头，劳动很累，工时很长，每天早5点上工，晚5点下工，中间除吃饭外几乎没有休息。就这样日本鬼子还嫌干得少，总是跟在劳工的后边，连打带骂，吆喝着“快干！快干！”

这里同样由于吃不饱，活计累，人身不自由，精神痛苦，生病的人天天增加。有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和照顾，还说有病不干活应该少吃点，每顿只给一小碗稀粥。这样一来病号更多了，轻病号变成了重病号以至死亡。平均每天要抬出十几具死尸。尸体被抬出，扔到离宿舍几里远的一个大坑里了事。更可怕的是塌坑的事故几乎天天发生，每次事故总有死伤。坑上下共分9层，我在第4层，深280米。5月间发生一次冒顶事故，压死5人，受伤者无数。前卫东山村的程德厚就是在这次事故中被砸伤了臀部致残的。

人们受不了这种折磨，为了活命，都想逃出这个18层地狱。

但是鬼子防范很严，除了电网和岗哨之外，还有监工的。甚至还想出许多绝招来，比如夜里出外大小便时得向小队长报告，家属来探望时，必须到辅导科见面，说20分钟的话，旁边还有人监视，听你说些什么。更绝的是，我们穿的上衣都是短袖，裤子都是短裤脚，这是特意制做的黄色劳工服，为的是让人容易辨识出这是劳工而不致于逃跑。当时人们把它叫做“摩登服”。穿这样的服装就是逃出去，也很难在人群中隐藏。劳工们自己原有的衣服也必须剪短，我刚去的头一天，因为没剪短衣袖和裤脚，被队长打了一顿。他说我留着长袖的衣服是企图逃跑。

也有少数人侥幸逃跑了，比如蛇山的马进国，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逃跑后被抓回来打个皮开肉绽，或者被打死，或者触电网而死。

有些有钱的人花钱运动一下，也可以回家。可是也有白花了钱毫无结果反遭其祸的。这里发生过这样一个悲剧：当时唯一运动的门路是医务科长和辅导科副科长，他们得钱之后，就由医务科给你报个重病号，辅导科派人把你背出去。刘把屯的王国君、永安堡的史振生、大栗屯的沈永隆以及马田国等都塞上了很多的钱（马田国家里为此卖了2亩地），但过了很多日子都没出来。他们家属等急了，想要找医务科问问。因他们不熟悉门路，走到辅导科去，正碰上日本科长。日本科长发现此事之后，进行追查。医务科长和辅导科副科长都畏罪逃跑了。日本科长到他们家去，共搜出三四包钞票来。他大发雷霆，借故把所有的病号都赶去干活。王国君本来有点轻病，被这么一吓，又带病干活，第二天就死了。

祖国光复救了我们

我在千山和弓长岭押了将近一年。天天受着残酷的折磨，既

没有钱行贿，又不敢冒险逃跑，只好熬着。我以为没有出头之日了，早晚必死在这里。

谁知到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坑洞里突然停了电，我们也不知道缘故，在洞里呆了一天没干活。晚上田中对我们讲话，他说：“我们日本皇军要回国去了，你们都好好的干，过几天都送你们回家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日本投降，不敢相信让我们回家的话。第二天日本人就走了。一些留下来的汉奸乘机向我们勒索抢夺，把劳工的衣服被褥都要了去，我仅剩的一件毛衣也被拿走了。绥中城里的魏连起、大栗屯的何某，被子都被要了去。

“八·一五”后第3天，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当天坐火车到辽阳，火车不再往前开，我们从辽阳徒步走到沈阳，还是没有火车，只得仍然徒步往家里走。我们沿途乞讨，一直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家。

我们在路上听说，绥中、兴城又有2000多劳工要装车，还没运走日本就投降了。受尽一年的折磨，幸亏祖国光复救了我们的命。但是，由于日伪的残害，使我得了眼疼的病，这种非人的亡国奴的悲惨历史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第二辑）

敲骨吸髓的阎王殿 ——日伪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历史考

方觉 姚云鹏

1943年春，伪满洲帝国的太上皇直接操纵和控制整个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使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和伪司法部次长太田耐造，共同策划与制订了《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与此同时，还强化了法西斯机构，将伪司法部行刑司改为司法矫正总局，任命伪司法部参事官中井久二为司法矫正总局局长。

《保安矫正法》于1943年4月，经伪满洲国国务院“次长会议”通过；经由伪满洲帝国傀儡皇帝溥仪裁可。

所谓《保安矫正法》就是把日伪“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捕捉，投入特设的“矫正辅导院”。以“矫正”和“辅导”为名，在进行非人道的所谓“精神训练”的同时，强迫从事超负荷的沉重劳役。而《思想矫正法》则是对一切认为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如“反满抗日犯”、“颠覆帝室犯”、“内乱犯”、“背叛犯”、“危害当局犯”、“对于建国神社及天照大神不敬犯”、“违反军机保获法犯”、“违反治安维持法犯”、“违反国防保安法犯”、“违反国家保获法犯”以及“违反暂行惩治叛徒法犯”，甚至从监狱刑满释放人员，认其出狱后仍有犯罪可能者，亦可押送矫正辅导院等等，均可以立即给以“预防拘禁”，使其长期服苦役。

《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即所谓“大东亚圣战决

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置制度”，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则可以收到“一弹双鸟”之实效。它既可以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高压手段，用以镇压无辜的中国人民，又可以成批成批地获得无偿劳动力，把被害的群众做为急需的劳动苦力，来为“共存共荣”和“圣战”卖命。

司法矫正总局是一个特殊的法西斯机关，它不受任何司法机关的约束，通过在伪满洲国全境内下属的11所矫正辅导院，可以直接捕人、关押、行刑乃至以各种手段置受“矫正”和“辅导”者于死地。这一切法西斯暴行均不须经过呈报任何机关，办理任何手续。1943年4月，伪司法矫正总局，先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哈尔滨、阜新、鹤岗、奉天（沈阳）、大石桥、齐齐哈尔、和龙县三和煤矿及长春等地，共建立了11所矫正辅导院。为扩充其反动势力，各地又陆续增建了一些矫正辅导分院。如1944年，抚顺矫正辅导院（总院）即增设了搭连分院，在东制油院内修监舍建立分院。其目的为了避免“辅导工人”暴动或逃跑事件发生。

抚顺矫正辅导院建立之后，为了确保收容者的拘禁，使其能“贡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预防犯罪为名，到处肆意抓人。捕人的形式，大致采取三种办法：

一、“个别索出”。所谓“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日伪警察、宪兵依据他们的意愿和判断，对于任何行为中的中国人民都可以随时以任何罪名，加以捕押，甚至包括外出上街旅行者。

1944年2月，日本警察把龙凤采炭所的“特殊工人”小队长，全部抓捕起来，经过一个多月审讯，严刑拷打逼供，最后终以“政治犯”之罪名，判处劳役，把宋庆昌（新四旅连长）、夏俊卿等人押送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二、“一齐索出”是一种规模更大，手段更为残酷的集中抓

捕中国人的集中行动的办法。日本当局把它称为“抓浮浪”。每次集中行动都要抓捕成批的无辜平民百姓。执行“一齐索出”，有时或者把一条街道，从两头卡死，逐个检查被堵截的每一个人，想抓谁就抓谁，愿抓多少就可以抓多少。有时连续“一齐索出”，组织所谓的“一齐索出防范周”，一连抓捕多少天。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遵照抚顺地方检察厅次长（权力大于厅长）日本人野田实次的命令，在抚顺的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了无辜群众300余人，经严刑拷打后，把其中250人送进了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三、“平时索出”。这是细水长流“不断索出”的办法。即各地日伪军警宪特机关，依据两个《矫正法》，只要抓捕者认为哪个中国人有犯罪可能，即可随时把“可能犯罪者”抓捕，押送矫正辅导院，予以“矫正”和“辅导”。

自1944年8月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伪抚顺市警察局特高课特务股长森川孝平（全国解放后，曾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曾以取缔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流言蜚语”为借口，在抚顺市内共逮捕了87名所谓“造谣犯”，逮捕了125名所谓的“思想嫌疑犯”。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一年多的时间，共逮捕所谓各种“案犯”2265人，其中“特殊工人”、“供出工人”为绝大多数，有900余人被押送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全满（东北）各省市矫正辅导院，均坐落于工厂或矿山附近，以便就地就近把被抓捕起来的“辅导工人”，进行监押，从事苦役劳动。抚顺矫正辅导院即设在新屯南山北面山坡上，地址处于龙凤采炭所和老虎台采炭所之间。

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在各个侵略战场节节失利，发展军事工业又急需大量煤炭、石油，为了加速开采东露天掘的油母页岩，新屯矫正辅导院的辅导警察把被“辅导工人”，天天起早贪

黑押赴东露天掘劳役现场。挖土方，运残土，为开采母油页岩创造条件，干那种正常人员负担不了的超负荷劳动。真像榨油机一样，压净抽干，一个活人只剩一把枯骨。根据“矫正辅导院令”第22条至24条之规定，对“辅导工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包括捕绳、联铁（即脚镣）、手铐、防声具、保护衣，以及滚笼（滚笼内四周设有尖刀，如将人装入滚笼滚动即可将人滚成肉泥烂浆，是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的特殊刑具）等，根据不同情况，各种刑具还可以同时并用。大批中国劳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蹂躏之下，就这样地被迫从事于法西斯集中营式的、非人道待遇的奴役。据日伪司法部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解放后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供词所载：“自1943年（伪满康德10年）至1945年（伪满康德12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止，在全满洲国（东北）11所矫正辅导院中，受‘矫正’和‘辅导’而被拘禁的中国人计有2万多人。”

各矫正辅导院的机构设置，总的是为了有效地监禁、管理、驱使被“矫正”和被“辅导”者服苦役，以及镇压其中的敢于反抗者。抚顺矫正辅导院，筹建阶段亦即建院伊始，司法矫正总局委托抚顺监狱代管，并任命该监狱副典狱长曾我宗次兼任矫正辅导院院长。地点先设在浑河北岸抚顺监狱，后迁往新屯南山北面山坡上，正式建立抚顺市矫正辅导总院，亦称新屯矫正辅导院。司法矫正总局重新任命了矫正辅导院的正、副院长及各职能科长，多由“日系”（即日本人）担任。院长古川英一、横田武极，副院长曾我宗次、小川文，职衔均为辅导官。院长，副院长下设3个职能科，科下设6个股。辅导科长芳泽留雄、照井明次郎、佐藤。辅导股长安静修，作业股长常如航，外役股长间物长次。外役股管辖内下设3个中队，即一中队长结成、二中队长藤野、三中队长孙寿山。庶务科长小川文（兼任）、平山，

庶务科下设庶务股长王文德、杨智明、周蔚彬；会计股长柳井；用度股长安静修。保健科长刘启贤，下设上药厂，主任辅导士2名为梁启永、付秉太。“日系”和“满系”（日本人和中国人）所占比例为日本人占56.5%，中国人占43.5%。辅导官佐以上均为日本人（参阅附表）。新屯矫正辅导院下设的辅导科为主管职能科，权限量大，管理“辅导工人”，负责“教训”、出劳役以及行使奖罚大权。外役股下设的3个中队均从事外出劳役。

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无论是“日系”的辅导官佐，还是“满系”的主任辅导士和辅导士，都是阎罗殿上的杀人魔鬼，身穿日伪辅导警察制服，佩戴警衔，右挎短枪，左挎长短战刀。关押“辅导工人”的监舍及“外役”场所，不是高墙壁垒，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铁刺线网、电网。监舍的铁窗、铁门晚间上锁，就是上厕所也不准出门。门外有固定岗哨及流动岗哨，警戒森严，日夜看守，使被“辅导工人”插翅难飞。

被关押在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的“辅导工人”的劳役十分繁重，生活待遇非常艰苦而残酷。辅导院纵然美其名设有保健科，实际并非保健“辅导工人”，而是保健辅导警察自身。“辅导工人”穿的是紫色或黄色号衣，形同囚犯一般。吃的是又脏又酸的高粱米饭团，发霉的玉米面窝窝头，无油少菜，一碗充满泥沙的淡菜汤。有时两三个人盖一床小薄被，所住监号，夏季里蚊蝇扑面，冬季里雪花飘飘，冻得“辅导工人”夜夜不能安睡。对所谓“思想不良”不愿出劳役者，还要加戴刑具服苦役。谁敢不服稍有反抗，则要立即给以“精神训练”和所谓“矫正辅导”。采取的手段是“举板凳”、“夹手指”、“抽皮鞭”、“灌凉水”、“吊大挂”等等。在辅导警察的刺刀、马靴、皮靴的督促下，“辅导工人”的劳役要干10个小时至12个小时，还有不少人带病也得去服苦役。用辅导警察的话说：“只要你脑瓜壳

还硬，就得给我出工！”辅导院的一切，真是残暴无情，敲骨榨髓，“辅导工人”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几乎天天有死人，“有时最多一天就折磨死60多人”（《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48页），如平均按最低每天折磨死者以10人计，从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建院之始到最终解体止，仅以500天计算，则死亡人数将近5000余人。死者尸体大都埋于新屯南山山后。有些“辅导工人”往往是清早上工出劳役，拖着病残之身走出大门，而在晚上却像死人一样被难友拖回监舍。

许多“辅导工人”吃不饱，睡不好，缺医少药，在得不到及时治疗‘根本不给治疗’的恶劣条件下，被折磨的悲惨死去。当时在抚顺曾流传这样几句民谣“矫正辅导院，活赛阎王殿，活着抓进去，死后算出院”。这足以看出“辅导工人”要想活着走出矫正辅导院之难。

备受折磨而遭惨死者天天有。至于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敌伪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可是日伪当局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在他们自己写过的一份报告里记载：“因卫生设备之不完善，及防疫措施不够，以致罹恶疫而死亡之不幸事件甚多。”日伪司法矫正总局对通化矫正辅导院曾作过一次认真统计，仅在监押过500“辅导工人”时，即先后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达40%。

抚顺矫正辅导院“监舍”卫生条件之差，饮食营养之坏，疾病率之高，曾引起日伪当局的“关注”。根据抚顺保健院文件记载“该辅导院是收容满、鲜、俄族的流浪者，以矫正辅导为主要目的，在抚顺炭矿东天露掘和东制油劳动生产，按昭和20年（1945年）2月1日当时的收容总数为1498人，其中‘自报’有病休息的127人，占总人数的8.5%，被认定为有明显疾病的241人，占总人数的16.1%，今年1月份死亡39人，占总人数

的2.6%……”

“该辅导院的‘宿舍’是砖瓦平房……只有一壁砖，房盖没有保温层，防寒防暑不佳，又很潮湿。室温和湿度，室温为5.4~11.9℃，湿度为82~89%，有湿冷感……通风不好，加上潮湿呕吐也不打扫，容易滋生病菌……”

另据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辅导士付洪恩的回忆材料：

“1945年8月14日下午，搭连分院押解400余名‘拘置者’送往新屯总院，当队伍走到阿金沟桥头左右，‘拘置者’举行了暴动，被辅导官及辅导士开枪打死1人，打伤多人。当晚9点新屯总院1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逃跑暴动，被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多人。”

“辅导科日本翻译官，主任辅导士×××指挥镇压‘八一四’暴动事件，造成打死20余人，打伤多人的罪恶。”

“主任辅导士×××（绰号×阎王）经常毒打被辅导人员，曾亲自枪杀2名被押人员。”

“主任辅导士×××、×××各亲手枪杀2名辅导人员。”

“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将‘拘置者’收容进去以后，关在冰冷潮湿的大房子里，剥夺人身自由，折磨成病不给医治，强制劳动。如有反抗，就运用皮鞭、镐把、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用火钎子烙等等。”

“1945年7月，在外作业时，一少年逃跑被抓回，绑在电柱上，活活被打死，并在院内展览尸体。矫正辅导院长横田武极还威胁说：如再有逃跑者和死者一样下场”。

1944年8月，又增设了抚顺矫正辅导院搭连分院，院址设于搭连嘴子。院长日本人芳泽、山口、井上、岗田，满系人（中国人）胡××，曹××。

分院下设两个中队，每中队下辖3个小队。日本人掌握全院

大权。由各地伪监狱抽调“骨干”充任科、股长和中队长以上职务。网罗“满系（中国汉奸）充任中、小队长和辅导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日伪档案记载和有关案犯承认：“被辅导关押者，因不堪奴役的悲惨境地，起而反抗暴动和逃跑事件也多起发生。”1944年以后，先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大石桥、哈尔滨等地的矫正辅导院或劳役作业场，就陆续发生过13起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1944年1月，1945年8月，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的被“辅导工人”，在张继武（原为我冀东八分区副营长）、宋庆昌（新四旅连长）的带领下，曾组织了两次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他们手持木棒、铁锹，同日伪警察和辅导警察展开了面对面的殊死战斗。

1944年1月，新屯矫正辅导院100余名被关押者集体逃跑。伪抚顺市警察局特务科长（警正衔）小林吹太郎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特务科特务股劳务系执行警尉矢内正美，带领特高股员会同龙凤的警察前去追捕。在新屯南山一名逃跑者被打死，40名被捉回。

“宋庆昌在矫正辅导院又很快团结了一些人，并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原冀东八分区的张继武趁敌人不备，夺下了看守的枪，然后带领几个同志暴动逃跑。可惜枪内无子弹，结果暴动失败，被抓了回来，遭到残酷迫害。”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米格式战斗机于当日凌晨，飞临煤城抚顺上空。新屯矫正辅导院负责的辅导官，为防止“辅导工人”暴动逃跑，被迫下令停止了外出劳役，让被“辅导工人”全部在监舍就地待命。这时宋庆昌同志为早日归队奔赴抗日战场，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被“辅导工人”集体暴动，他们砸碎铁门、铁窗，越过了刺线、电网，赶跑了站岗放哨的辅导警察，冲出了铁锁的牢门。

抚顺矫正辅导院组织机构系统表①

(194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司法部矫正总局

抚顺矫正辅导院

院长 古川英一
横田武极

副院长 曾我宗次
小川文

保健科长 刘启贵

辅导科长 照井明次郎

芳泽留雄

佐藤

庶务科长

平山
小川文

上药厂

主任辅导士

付兼太
梁启永

辅导股长——安静修
作业股长——常如航
外役股长——间物长次

用度股长——安静修

会计股长——柳井

庶务股长——

王文德
周蔚彬

三中队长——孙寿山
二中队长——藤野
一中队长——结成

抚顺矫正辅导院搭连分院组织系统表②

1944 年 8 月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抚顺矫正辅导院搭连分院

分
院
长

曹 兴
胡 中
井 上
岗 田
芳 泽
山 口

一
中
队
长

张永年
大 场
新 井

三
小
队
长

王 × ×
魏 × ×

二
小
队
长

李 × ×

一
小
队
长

姜 × ×

二
中
队
长

董 毛
楼 井
诸 岗

三
小
队
长

张 × ×

二
小
队
长

王 × ×

一
小
队
长

佟 × ×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人间地狱——浮浪营

肖紫光

更生训练所

设浮浪营是日寇奴役中国人民的最残酷手段之一。营城煤矿的浮浪来自长春市民。为了保证浮浪的供应，市公署在长春东大桥地区特设“更生训练所”，所内豢养一帮专门抓人的坏蛋。抓人的方法是，首先采取宣传讲演形式以诱听众，一待听众群聚，则围之将听众捉上车，载送更生训练所而拘留之。宣传讲演法失灵后便改用封街堵巷截抓行人的暴力办法。最后竟疯狂地夜闯民宅堵被窝抓人，来完成每人必须完成的抓人指标。于是弄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

人们一旦被抓进更生训练所即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与世隔绝，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只有坐等下一个更坏的命运——送浮浪营。更生训练所抓人达到所需数目，即以“献身队”名义编成队。2人一伍，同戴一副手铐押送煤矿，下车后在刺刀狼犬的严密监视下送往浮浪井口。迈入浮浪营的门槛如同进了“鬼门关”，很难活着出来。

营城煤矿的浮浪营

营城煤矿已有120多年历史。最早居民在开采火石时偶然发现煤层，遂有附近农民季节性开采。1908年当地官僚地主先霸占了全部小煤窑，后来又为吉长地区大官僚资本家所掠夺，成

立了“隆吉”、“裕东”、“营城”等矿。日寇铁蹄踏入营城煤矿后强占了蓄量丰富的南矿，成为营城煤矿最大占有者。

1944年冬，日寇为了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于矿区西郊（现九井处）建立了浮浪营。浮浪井虽为日寇出煤，但日寇不直接管理井口事务，而由听命于日寇的二刘来主持全面工作。在行政上他们是正副井长，在武装（自卫队）方面他们是正副大队长。大队长以下设有队长、班长等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汉奸把头。

二刘者何许人物？因年久名字已经忘记。只知一个是黑山县人，曾当过伪县长；一个是舒兰县人，绰号叫刘大烟袋，系一流氓无赖。二刘为人凶残，是统治密山煤矿浮浪营的老手。

浮浪营四周设有通电的3道铁丝网，只为浮浪留有二个卡子门。一门是只进不出，一门是只出不进。这只出不进的门是专为拾被摧残致死的浮浪尸体设置的。营内共有草房3栋，前栋是汉奸把头办公室，后栋是仓库和为生产服务车间，中栋是浮浪居住的大房子，装着铁窗，以防浮浪外逃。卡子门有自卫队员站岗，大房子周围有自卫队员巡逻，每炕有一名炕长，面对面地监视浮浪的一举一动。

非人的浮浪生活

浮浪比一般劳工苦难更为深重，迈进浮浪营的大门首先被扒光衣裤，换上为浮浪特制的劳动服。劳动服只发两班人用的，入井班穿，升井班脱，三班倒换，总有一班光着身子。这是汉奸把头防止浮浪逃跑想出的鬼主意。睡觉没有被褥、没有枕头，只好光身躺在露土的破席上。吃的是粗高粱米饭和咸菜条，见不到油腥，顿顿吃不饱，忍饥挨饿。在井下劳动十几个小时。这种非人的待遇，要不了多久，就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浮浪井的劳动分两类：一类是技术工种，由几名老技术矿工担任；一类是刨镢、装锹、背筐的重体力劳动由浮浪承担。在井上浮浪受着重重监视，在井下有遛掌子把头监督。每天入井时间未到，催工把头手持木棍早来大房子破开喉咙大声吆喝：“到时间啦，赶快集合入井！”进井后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把头发现有人伸伸腰喘口气，就抡起木棍敲头。掌子面的安全条件非常不好，伤亡事故屡有发生，但统治者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有一次发生冒顶事故，埋里了2名浮浪和一些机械。浮浪们拼命抢救被埋的弟兄，可把头到现场却阻止救人，逼着先抢出机械，并丧心病狂地说：“两条腿活人有得是，死了几个没关系！”

浮浪井顶板淋头水很大，不等干完半个班衣服就淋透。夏天还好，最怕冬季，因井口离大房子有百米远，一出井口不等到屋衣服已冻成硬壳，须用体温慢慢暖软方可脱掉。

浮浪最怕的是负伤患病。因为劳动力的丧失是浮浪价值的丧失，价值的丧失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营内虽有医务室但不给负伤患病的浮浪诊治，临到上班时催工把头用木棍敲着病人的头说：“脑袋硬不硬？脑袋硬就得上班！”所以，能走能动的伤病号就得挺着病痛劳动，一旦病重不能起炕那就大祸临头了，被抬到医务室进行“隔离”，不予治疗，不给饭吃，直至死亡。有的尚未断气就抬到尸体房。病人常央求说：“别抬走，我还能治好。”回答是：“在尸体房里等着好吧！”就这样把一些能治好的病人活活冻死了。一次冒顶，一名浮浪被砸伤了双腿，汉奸把头看他伤势严重，治好了也得丧失劳动能力，遂下令直接抬往尸体房，之后带着活气把他抛进“万人坑”。当病人被吃惯了死尸的野狗撕咬疼痛醒来，一面与野狗搏斗，一面有气无力地嘶喊，幸有人路过闻声赶来将其救起方得活命。

仇满万人坑

浮浪死于冬天尸体并不立即送往“万人坑”，暂放在营外的尸体房内，脱光衣服5人一排一横一竖垛起来。直到春暖解冻才用专载尸体大车送到“万人坑”。

营城煤矿浮浪营自1944年冬成立至1945年光复，共接收3批浮浪，总计900余人，光复后幸存者仅60余人，其余800余人都葬身于“万人坑”了。

浮浪营的统治者无视浮浪的死活，是由于浮浪的来源无须汉奸把头担心，而死亡减员他们能获得一笔额外收入。1名浮浪死去，把头可从日本主子处领取80元的劳慰金，新进1名浮浪又可领取80元的募集金，这样一死一进就可得160元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浮浪无限度地压榨。

浮浪的反抗与暴动

1945年春，日寇已知末日不远，对浮浪压迫更加残酷，逼得没有活路的浮浪满腔怒火，计划伺机逃跑和暴动。在一个风雨天，10余名浮浪乘自卫队看管松懈之机，一起破网而逃。因体弱无力、跑动艰难，这些人刚登上北山不幸被自卫队抓回而惨死在棍棒之下。也有冒死埋在炭车里随煤炭运出井口而脱险的，但为数极少。汉奸把头为了赚钱辞退了工资较高的井下木匠，用浮浪代替。当木匠就有了随手的斧锯，有了斧锯也就有了武器。早想反抗的浮浪便于井下秘密策划暴动，准备由一人借入厕之机将大房子纵火点着，一旦火起室内人即动手砍死炕长冲出门去，再杀尽所有汉奸把头，然后破营而逃。谁知事先有内奸告密，暴动即将进行，突然，持枪自卫队闯进屋来进行血腥镇压，一次经过周密策划的抗暴斗争就这样淹没在血泊

里了。

浮浪营悲剧已过四十几个春秋了。每当提起这段悲惨往事，知情的老矿工依然哀叹不已，潸然泪下。他们叮嘱我把浮浪营的情况记下来，使后人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

浮浪营里六十天

马金钟

在旧社会，关里家生活一点路也没有了，我就拉家带口地来到关东，到长春市宋家洼落了户。找个职业吧，可是在伪满那个鬼年月里，咱们穷人两眼墨黑上哪找去。没办法，为了糊口度日也就指望我这个铁匠手艺。穷人心连心，邻居们周济我，好歹凑了几个钱，设了一盘打铁炉，又弄了点破铁开始打轱辘马卖。哪知好景不长，就因为买点破铁惹来了天塌的大祸。那时，一群便衣特务和警察狗成天不离开你转，挨家挨户地翻腾。谁家有点东西认为可疑，就算犯法，就把你抓起来。看谁不顺眼，也把你抓起来带走。弄得家家男女老少哭喊连天。有一天，一个特务在我们家翻出一块道铁来，当时就要把我抓走，多亏邻居们说情，凑了20元钱给他填了腰包才算了事。哪想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花了我的钱还要送我的命。第二天日本鬼子和一群警察狗开来个电驴子（摩托车），把我抓到宽城子警察署。一天一宿过了好几遍堂，硬说我破坏了铁路线，说这块道铁就是真赃实证。我不承认就灌辣椒水、压杠子、过电，就是铁也给你打熟了，何况是人啊！我糊里糊涂地就承认了“破坏”二字。他们逼出了口供，就偷偷地把我送到市郊更生训练所。

11月的一天晚上，北风呼呼地吹，又下着小雪，日本鬼子挑出我们100余个年轻力壮的，五花大绑，一串十来个，用黑布蒙上眼睛，押着就走。我寻思这回可完了，说不上弄哪枪毙去呢。爹娘妻子怎么办哪！爹娘啊，你算白养我一场，鬼子屈打成招要了儿子的命。我迷迷糊糊地跟着走，到了火车站，上了闷罐车，一直拉到营城煤矿的“浮浪坑”。

一进屋把全身衣服就给剥了个溜光，几百人赤身裸体地挤在一块，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蹲，动也不敢动。一会蹲得腰酸腿痛，半截身子都麻了。有些人受不了，刚一伸腰蹬腿，也不知哪来的大棒子没屁股没脑袋地劈打你一顿。一边打还一边骂着：“你们这些该死的鬼，不给你们点厉害尝尝，真不知道二郎爷三只眼。”打得你头都不敢回，如果你回头，拉出去就把你往死打。

剥下你原来的衣服，给你换上灰色的浮浪衣。鬼子和警备队长说给我们衣服保存起来，实际上他们早已给卖了。这时给你拿来那刚从死浮浪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一个汉奸小队长最可恶（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用棍子挑着一套灰棉衣，在我跟前一扔非让我穿不可。我一看上面连粪带尿沾得挺厚，臭气难闻，虱子在破棉花上出出进进地爬，这明明是在死人身上剥下来的，我哪肯穿呢。他看我不穿就用棒子揍，揍得我磕头作揖、哭喊连天哪，不穿还是不行，死逼无奈我才穿上这身死人衣服。

一天两顿饭，一顿粗高粱稀粥，一顿榆子面掺豆腐渣做的饽饽。一个饽饽不过3两重，一个人只给一个。榆子面掺豆腐渣蒸出来都不成个，一拿就散花。新出屉不管多么热，用手捧着逼着你吃，要是吃不下去就揍。热的不用说吃呀，拿着还把手烫得通红呢，往肚里一咽，简直把嗓子都烫破了。上顿剩的饽饽冻得像石头子一样硬，那你也得啃，不啃就打，吃不了也揍。

哪里来的盐菜酱啊，吃口野菜都是好的，在院墙根偷拔野菜吃，要是让警备队看见也得挨打，真是人连猪狗都不如。

再说喝的，连口凉水也喝不着。出去大便的时候偷着往嘴里塞把雪。真像得了菩萨的甘露水一样。这要让警备队看见也是连打带罚，打完了还得让你把尿冰块吃了。

拉屎撒尿一个人不准出去，必须得凑六七个一块出去，后边有人拿枪看着你。怎么能那么凑巧都有屎尿呀，碰不上就得憋住。有的把尿撒在裤兜子里，有的把屎拉在裤兜子里，还不敢出声，要让警备狗听见就得打你个半死不活。当时有一个人正赶上闹肚子，因为凑不上六七个人，就把屎拉在裤兜子里了，恰好被小队长听见了，抡起棒子就是一下子，把他打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正赶上开饭，这个恶狼就硬逼着他用手把屎捧出去，完了还逼着他用手捧饭吃。

数九寒天，黑屋子里八面透风，墙壁上、棚顶上都是冰霜雪块的。生个炉子还不让好好烧，一天烧那么一会儿。但这也是我们最温暖的一块宝地，我们每一个都披条破毯子围在炉旁边取暖睡觉。一天，日本鬼子和汉奸来查房，进屋一看我们这些人围着炉子躺着呢，就气势汹汹地抡起棒子、皮带、皮鞭，暴打了一阵。

经过十几天的折磨，混身上下就剩一把骨头架子了。饿得昏昏沉沉、有气无力，可是这样还得下井干活，早晨黑古隆冬的时候就得起，吃完饭就得站排往井口跑。铁丝网、电网好几层围着你，生怕你跑了。晚上不见日头时从井下升上来就往回跑。如果开采时正赶上个“水掌子”，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冻得直哆嗦，出上坑口门就有冻死的。在井下不知东南西北，真是蒙头转向。监工的日本人和汉奸队拿着大棒子看得你寸步难行。并排着一个掌子面掘煤，一个隔一个都有五六步远，

谁也不准跟谁说话，如果看见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就说你心坏了——想跑，上去就是一棒子，打死就打死，不死算你命大。

我们这些人哪有懂得煤矿技术的呀，可是顶棚子、放炮都得你干。我亲眼看见顶棚子让木头砸死的，放炮崩死的不知有多少。有一次，我在这边蹲着等车，掌子那边就放炮，也没有人告诉你，炮一响，“哗啦”一下子顶煤、帮煤落下了一大片，好险没砸死我。就这回埋到煤里的就有十来个人。人死了也不往上拉，等着冒顶埋上拉倒，死的人没法数。就因为受不了罪，在巷道上用破电线悬梁自尽的、由于逃跑爬天井滑下来摔死的，也不计其数。

这样，日本鬼子和汉奸还嫌死得少。在大房子里，人还有气就把你拖到外边冻死。得了病就给你隔离起来，不但不给治，连饭也不给你送。活活地憋死、饿死。刚发觉你有一点病，鬼子和汉奸队头子们就踢你脑袋，看你硬不硬，硬，就得下井干活。当时拉死人的，专门就有辆大马车，不停地往外拉，扔到万人坑里让狗吃掉。自从我被抓进了这个人间地狱后，就像鸟入了笼，想跑跑不了，想死死不成，连条裤腰带都不给你扎。虽然野兽们这么折磨，我想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1945年正月初五，下午2点多钟，我正在坑内干活呢，一个老工人走到我跟前问我：“你叫马金钟吗？”当时却把我问愣了，我害怕地硬着头皮应了一声。他随手在工具兜子里拿出一套青色的工人服让我穿上。我当时很犹豫，刚想问由来由，他随即说：“快穿上，背着我的工具兜子，快跟我走！”我一听这话，心想“管他呢，跟他走，不走也是死，好—好我还死不了呢。”我俩一口气走出了井口，出了甩车场就往岔路口走。当分手时那位老工人说：“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叫杨义成。快走吧，前边有人等着你。”我当时不知说啥是好，跪下就磕了一个头。

这时我二弟马金香迎面走来，把我接回家。

我到家后一头躺在炕上有两三个月，家里人一看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都痛哭流泪。就这么60天的磨难真比60年还难过。后来我好了，也解放了。真的，要不是解放，要不是有党对我的关怀照顾，不要说我一个马金钟啊，就是10个马金钟也死了。

（谢步锦整理）

伪满新京更生训练所内幕

申文明

伪满康德10年（1943年）7月，在伪首都新京特别市（现长春市）朝阳桥西侧一片空地上，搭起了十栋双排用芦苇席制成的“浮浪”工棚，棚的四周用铁丝网圈起来，并在工棚的周围竖起了由伪首都警察厅警备队值勤的了望台，门前挂了一个“新京特别市更生训练所”的木牌，这就是“新京更生训练所”。从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的两年时间里，这座人间地狱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成立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历史背景

日伪当局继1941年12月27日的“治安维持法”公布之后，又于1943年9月18日，公布了两项据之可以任意迫害东北人民的所谓“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

为了贯彻实施这两项反动法令，在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它从1943年4月27日成立后，相继在

伪满各大中城市成立矫正辅导院几十所。有的用其他名称代替矫正辅导院，如奉天叫“济生院”，而新京则叫“更生训练所”。日伪当局进行“抓浮浪”的活动，往往以抓逃跑的劳工为借口来实施。据1943年4月21日“满洲新闻”披露，为抓捕逃跑的劳工，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及其所属的各警察署、派出所，于1943年4月19日全员出动，在市区内对逃跑的劳工实施大搜捕，加上夜间的连续搜索，两次就抓捕了3160人，并将其中的1287人送至炭坑、矿山强迫就劳。这就是以抓捕逃跑的劳工为名，行搜捕“浮浪”之实的典型。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亦即所谓的矫正辅导院。1943年春，在伪司法矫正总局长中井久二的监督与指挥下，以“净化首都，强化治安”为名，由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副市长大迫幸男兼任伪首都净化工作班长，与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2人决定成立“新京更生训练所”，专门负责伪首都净化工作中对“浮浪”进行所谓“精神训练”与“矫正思想”等活动。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组织机构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于1943年7月开始组成时，由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兼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理事官平岗修治派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川原一郎，兼任伪“新京更生训练所”顾问，并以该所顾问为掩护从事侦谍活动，由平岗修治派其直接掌握的伪首都警察厅外事科嘱托王相如，兼任伪“新京更生训练所”所长。此外，还由王相如物选其亲友李丛林任该所副所长，宁守铭任该所作业大队长，刘焕文任该所会计，何尚清任该所劳务，王文选任该所宣抚，迟庭玉和姜文超任该所杂务员。并由王相如从被抓来的“浮浪”中挑选刘金荣、刘德堂、张福

林、贾福堂等4人为作业中队长，王恩沛为作业记工员。当时由上述人员负责对抓来的500余名“浮浪”的监管工作，并由伪首都警察厅警备队派20余名武装警察，在该所铁丝网外负责警戒。这些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成员除川原一郎、王相如住在长春四马路满洲旅馆外，其余都住在该所内，实施日常对“浮浪”的监管，每天“浮浪”出工为日本关东军修建仓库等劳动，都是由作业大队长宁守铭具体负责。因宁守铭与王相如1942年以前同在伪永吉县公署当汽车司机时，交往密切，与当时担任该县副县长以后转任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很熟悉，深得川原一郎、王相如2人的信任，所以，由宁守铭负责对该所“浮浪”的管理工作。

1943年11月，在伪“首都净化工作班”的授意与安排下，组成了由伪“新京更生训练所”领导的“新京采炭报国队”，由川原一郎兼任该队顾问，由高近孝一任川原一郎的助手，高近孝一被征兵入伍后，由高近孝一的弟弟高近二郎顶替。由王相如兼任该队大队长，由原“新京更生训练所”作业大队长宁守铭担任该队作业大队长，由原“新京更生训练所”作业中队长刘德堂、刘金荣、张福林担任该队中队长，由原“新京更生训练所”会计刘焕文担任该队会计，由王相如的亲友张林经担任该队监理，李庶唐担任劳务，王子泉担任该队联络员，王子升担任该队小卖店主任。该报国队组成后，于1943年11月，经王相如从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浮浪”中挑选青壮劳力300名，编成第一批“新京采炭报国队”押送到密山滴道炭矿暖泉炭坑下井挖煤。直至1945年8月，共从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浮浪中编成十多批，每批200至300名“浮浪”组成的5000余名“新京采炭报国队”员，押送到密山滴道炭矿去挖煤。该报国队因“浮浪”逐年增多，其组织机构也在不断扩充，因当时川原

一郎与王相如在对“浮浪”的监控及在经济上分赃不均，经常暗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川原一郎凭着自己是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的权势，王相如依仗他是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的靠山，两人互相争斗十分激烈，为各找靠山，不常呆在密山滴道炭矿，而常住长春的满洲旅馆。这时由川原一郎指定高近二郎担任该采炭报国队的顾问，王相如指定其师兄弟张林经任该采炭报国队监理，代理他执行采炭报国队大队长职务。直至1944年初，在川原一郎的暗中活动中，暂时削去王相如的领导权限。由川原一郎安排他在伪舒兰县警务科特务股长和伪舒兰县小城子警察署指导官时的朋友，担任过小城子小学校长的丁连文，担任伪“新京更生训练所”所长。

丁连文从1944年春任所长时，仍由川原一郎担任该所顾问。将该所由西朝阳桥外迁至东安屯北侧，该所当时收容“浮浪”200余人，给附近的营口窑业会社修建住宅。这时王相如住在长春二马路广益书店，丁连文每月按时派人给王相如送薪金。至1945年春，因1月间川原一郎死亡，又由平岗修治任命王相如任所长，把丁连文派到密山滴道“新京采炭报国队”任总队长。在丁连文担任所长及总队长期间，在川原一郎的授意下，将王相如的亲友全部撤换，由丁连文从舒兰县小城子镇亲友中安排程文贵为文书，李守福、王梦获为会计，孟兆富、宋继明为用度，刘效英、杨洪山为劳务，赵景武为伙食长，王子泉为联络员，张学臣为通信员，刘畅亭、刘海林、程文贵、战希相为作业大队长，贾福堂为作业大队附，郑华林为自卫队长，张国治、蔡德云、何永春为作业中队长。在丁连文任所长期间，共往密山滴道炭矿押送“浮浪”1000余名，押送到营城子炭矿“浮浪”500余名，押送到鞍山弓长岭铁矿“浮浪”200余名，押送到大连大房身造船厂“浮浪”100余名。并安排其亲信分别担

任上述各“报国队”的主要头头。

1945年春至8月，王相如在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的支持下，又当上所长，并把开过铁工厂、经常和王相如在一起抽大烟的烟友刘德介绍到所当副所长，把丁连文分配到密山滴道炭矿担任“新京采炭报国队”总队长。此间，伪首都地方保安局还安排保安局特务田中办次为顾问。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主要任务

从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职能看，其主要任务：一是在伪首都警察厅的领导与指挥下，对伪首都警察厅及其所属警察署、派出所通过搜捕抓获的“浮浪”，押送到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后，由该所统一实行监管，白天监视劳动，夜间关押看守。二是按照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动员科的安排，由伪“新京更生训练所”顾问、所长、作业大队长等人，挑选“浮浪”中的青壮劳力，分批押送到各“新京报国队”，到炭坑、矿山从事不给报酬的繁重劳动。三是该所对“浮浪”从炼成辅导及矫正思想的精神训练看，主要是由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顾问、所长、作业大队长等人对“浮浪”进行奴化教育，说什么“把你们这些无业游民和不愿干活的人集合起来到炭坑、矿山者劳动不仅为大东亚圣战出力，也可以就业赚钱。”因所长王相如是“新京护国般若寺”的居士，经常请该寺和尚善果方丈为“浮浪”们讲经说法，为“浮浪”们受戒，向“浮浪”们讲因果报应等宿命论，说什么“到更生训练所服劳役是命中注定，不能进行反抗或逃跑”。王相如还威胁说“谁劳动好了，可以就业赚钱，谁若参加暴动或逃跑，那是自讨苦吃，打死活该”。四是从该所对“浮浪”的管理上看，除到炭坑劳动者外，凡是三五人外出劳动或上厕所，不仅有自卫队手持木棒看管，而且用绳子成串拴起

来。夜间睡觉时，由自卫队看守，不准说话，不准翻身，如有违犯，轻则受到斥骂，重则遭到棍棒毒打。更有甚者，为防止“浮浪”逃跑，在“浮浪”睡觉时每两个人给戴上一副手扣子。

从伪“新京更生训练所”主要负责人的活动经历看，他们都具有特务身份和特务活动经历。不仅在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对“浮浪”通过侦谍网络进行监视和侦察控制，而且还在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范围之外，广泛进行秘密侦察活动。

勒索“浮浪”的赎身费和劳务费

王相如、川原一郎长期住在伪新京市满洲旅馆，其目的是为了从被抓“浮浪”家属亲友中勒索巨额赎身费。其勒索办法是托人找到王相如后，按拿钱多少分成先后去办理，以宏济院的诊断书为根据，说是得了不能劳动或有传染病的诊断而取保放出。例如1943年秋，家住长春市八里堡的车夫高玉林，在上街买菜时被伪东荣警察署当“浮浪”被抓去，第二天押送到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监管，在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关押29天，经家中托人找到王相如花了伪币1000元才赎出来。29天中，每天干笨重活，共挨4次毒打。高玉林亲眼看到死了二十几个“浮浪”，平均每天死1人，都是因无故挨打，吃不下饭或病死的。并看到每天都有警察署往伪“新京更生训练所”解送“浮浪”，分3次送各地“劳动报国队”去服苦役，平均每10天就押送走一批200至300人。像高玉林这样用1000元赎身费的属于中等类型，有的要花上2000至3000元，才能钱到放人；最低等的也要拿出500至600元，才能把折磨得半死的人放出。据知情人讲，每月找王相如要求花钱往回赎“浮浪”的至少有3至5人，王相如任所长期间，每月平均有两份中等类型的“浮浪”家属亲友托人给王相如送赎身费。这样，王相如最少在腰包中要装

上伪币5万元之巨。

据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副所长李丛林、监理张林经、劳务主任李庶唐、会计主任刘焕文、庶务主任王恩沛等多人回忆，伪“新京更生训练所”共收容监管“浮浪”7000余人，仅押送到密山滴道炭坑的“浮浪”共计有5000余人。在送去之前由王相如、川原一郎代表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由密山滴道炭坑代表伪满炭矿会社，共同签订合同，对每个“浮浪”每月支付给伪“新京更生训练所”30余元作为劳动报酬。以密山滴道炭坑每年付给伪“新京更生训练所”5000名参加“新京采炭报国队”“浮浪”的劳动报酬算，他们每年要付给伪“新京更生训练所”伪币180万元，去掉每个“浮浪”每月10元钱的伙食费，每年王相如、川原一郎要克扣这五千名“浮浪”120万元的劳动报酬，除上缴给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及伪首都警察厅40%作特务活动经费外，其余60%都由王相如、川原一郎、丁连文等骨干分子支配了。

王相如对“浮浪”的劳动报酬的分配方案，曾向所有“浮浪”公开宣布过，他说：“你们（指‘浮浪’）的劳动是有报酬的，每月好好干能赚30余元，由所里保存，等大家回去时发给。”实际上除每人每月发给1元钱零用外，并未发给“浮浪”的全部应得之劳动报酬。仅在1945年春，王相如就从密山滴道炭坑提走“浮浪”的劳动报酬50万元伪币。

川原一郎之死

1943年4月，川原一郎从亚布洛尼撤回伪新京后，伪首都地方保安局为开展对伪首都的所谓无业游民及懒惰者即“浮浪”的侦谍活动。王相如于1942年10月，被平岗修治派到苇沙河县亚布洛尼镇昭田出張所，以木材检尺员为掩护，在伪首都

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川原一郎领导下，因会俄语对当地的无国籍白俄从事侦察活动，并利用木材检尺员身份，广泛结交伐木把头，从中探听伐木劳工的动态。王相如在昭田出張所の半年期间，除对无国籍白俄及劳工从事间谍活动外，还依仗检尺员的身份，从伐木把头手中勒索伪币2600元，从当地无国籍白俄猎户手中勒索熊皮2张和熊胆两个，将熊皮转送给平岗修治，将熊胆转送给川原一郎，用此手段取得了日本特务的进一步信任。而后由平岗修治保荐，王相如得以擢升。

1943年7月，伪“新京更生训练所”正式成立时，由顾问川原一郎推荐他信任的原在亚布洛尼昭田出張所当伐木把头的肖明馨当副所长，不久因另有特务活动任务川原一郎将其派回亚布洛尼。王相如乘副所长职务空缺之机，推荐其朋友李丛林担任副所长，推荐其师兄弟张林经任该所监理，推荐其在伪永吉县公署开摩托的司机同事宁守铭担任该所作业大队长。此后王相如自恃有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兼外事科长及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理事官平岗修治为靠山，又有上述亲信任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的骨干，所以就肆无忌惮地任意妄为，利用职权之便大肆侵吞“浮浪”服苦役的血汗钱，克扣“浮浪”的衣食费，收受“浮浪”家属的贿赂财物，大发横财。顾问川原一郎对王相如的这些行径非常嫉恨，表面奉承周旋，暗中削弱王相如的权限和势力，川原一郎暗中削弱王相如权限和势力的夺权活动，等于卡住王相如大发横财之道，因而引起王相如阴谋除掉川原一郎，夺回自己既得权势之念。因王相如长期与无国籍白俄及日本人交往，特别是经过与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的交往，学会了一整套的处事哲学。他感到川原一郎既是日本人又有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的特务身份和伪“新京更生训练所”顾问的权势，明目张胆地赶走川原一郎夺回自己的权势，不

仅不能得逞，还会遭到杀身之祸，故经过周密考虑，对川原一郎采取了隐晦而狠毒的手段。

王相如被川原一郎挤出伪“新京更生训练所”之后，虽然去各地报国队视察，但仍经常回到新京，与川原一郎共同住在满洲旅馆内，他一方面每日充当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理事官平岗修治家庭的副食免费采买员，自己掏钱给平岗修治买鸡、鱼、蛋供其家属享用，表面上与川原一郎来往频繁，交往甚密。王相如为了不露马脚，对给川原一郎送去的已下了慢性毒药的高级酒，都是同桌共饮，王相如则在事前吃上解毒药。至1945年1月，王相如的阴谋得逞，当时35岁的川原一郎死在了伪新京的顺天病院。对川原一郎之死，伪首都地方保安局曾产生过怀疑，也曾多次找王相如进行查问，因是二人同桌共饮，虽有顺天病院对川原一郎是酒精中毒死亡的诊断，也只是不了了之。川原一郎上述中毒死亡之谜，是在事隔10年之后的1955年王相如的坦白中才揭开的。

王相如除掉川原一郎，复得伪“新京更生训练所”所长的权势之后，仍不以此为满足，于同年6月至8月，在平岗修治的支持下，兼任铝币回收门市部的经理。平岗修治当时对王相如讲：“你为首都警察厅出了很大力，现在批给你一批统制物资，用这批物资回收一角和五分的铝币，每天送到中央银行换取纸币，回收铝币好集中起来造飞机，你可以从中发财。”这时由王相如遂同其亲友张林经及李庶堂、车鹏程、刘介臣、罗学岐、王文光、姜希交、马德庆、李延佑等人在长春市二马路商务印书馆门市房开始办理用统制物资换收铝币业务。当时经平岗修治给办理手续，由王相如、张林经2人用马车从伪新京特别市公署仓库拉回统制物资棉布、棉线织品、毛衣、毛裤等十几车，共用上述物资从民间换回铝币100多麻袋，送伪中央银行换回伪

币60余万元，按平岗修治命令由王相如保管。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时，王相如将保管的60余万元伪币，除发给李庶堂5万元和发给车鹏程、刘介臣、罗学岐、王文光、姜希文、马德庆、李延佑每人各1万元伪币外，其余50万元现金和价值50万元剩余的统制物资，在王相如的主张下，王相如分得三分之二，张林经分得三分之一，他们都发了一大笔“光复财”。

具体活动与暴行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从1943年7月成立，到1945年8月瓦解，共收容监管过7000余名“浮浪”，并将这些“浮浪”先后分成28批，由伪首都警察厅派警察及伪“新京更生训练所”派管理人员，分别押送到密山滴道炭坑、营城煤矿、鞍山弓长岭矿山和大连造船厂等地，组成“劳动报国队”服无酬之劳役。据统计伪新京特别市在此期间共有居民147 183户，人数721 138人，平均21户即被抓去一名“浮浪”，占人数的1%。这是个平均数字，因被抓去的“浮浪”都是男性青壮年，若按男性青壮年人数算，这72万余人中女性占一半，男性中青少年学生及无劳动能力者占一半，各部门中的伪职员及有业者再占去70%，实际无业者及小商小贩青壮年只有6万余人。按这种实际的办法计算，当时每百名无业者及小商小贩中就有12名被当作“浮浪”抓去服无酬之苦役。这7000余名被抓去服无酬劳役的“浮浪”，除其本身因遭到残酷的盘剥与虐待，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行贿、赎身或逃走一小部分外，仅因被迫承担超负荷劳动劳累而死、因饥寒病饿而死、因事故而死，因逃跑时触电网而死，或因逃跑被抓回打死者共计有5000余名。正因如此，至1945年8月伪“新京更生训练所”瓦解时，仅剩下“浮浪”2 000名得以

生还回家。这不仅使7 000名被抓“浮浪”的家庭因失去青壮劳力而走向更加贫困，甚至因生离死别而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且也使这些被当作“浮浪”被抓去服苦役而虎口余生的生还者，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而奄奄一息。